

追求优秀 传递大美

□安武林

习近平总书记去年主持召开的文艺工作座谈会，是继我党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召开的又一次重要的文艺工作会议。它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重大的现实意义。

读书应当成为我们的生活方式

当下，不少人忧心忡忡，认为我们国民的读书量越来越少，与别的国家相比差距甚大。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是，习总书记在座谈会上说：“读书已成了我的一种生活方式。”我以为，这是一种表率，一种倡导，一种指示，一种精神，一种风范，一种人格魅力。虽然这是对文艺工作者所讲的一句话，但我觉得对我们国家的每个公民都非常适用。

在我们当下，不少的作家都很浮躁，忙于创作，无暇读书。在他们看来，写比读更重要，写比读更实惠。这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畅销书作家不读书，忙于生产新作品，有点创作水平的作家不读书，觉得自己创作水平已经很不错了，不需要读书。无论是浮躁，还是自满，都是不去读书的理由和借口。读书，应当成为我们的生活方式，而不仅仅是为了提高写作水平。有学历的人，不一定是有素质的人。同样，我们的作家，不一定是有素养的人。而素质和素养，和自己的文学创作水平不是正比的关系。

习总书记的话，在我看来，他是倡导每个公民都应当把阅读当成一种生活或方式。我们要建立书香社会、书香校园、书香城市，如果没有广泛而又普遍的阅读行为的支持，那么，这只能是空谈。我们的儿童文学作家，不仅要用自己的作品影响我们的下一代，而且也应该用自己的行为去影响我们的孩子。在阅读行为的推广上，作家应该首当其冲，担负起这个使命。对成人而言，阅读应当成为我们的生活方式，而对孩子们来说，阅读应该成为他们的一种习惯。所以说，习总书记的话，我以为也是中国梦的一项内容。换句话说，就是让我们这个民族成为世界上有良好阅读行为和良好修养的民族。

低俗不是通俗，欲望不代表希望

习总书记在座谈会上说：“低俗不是通俗，欲望不代表希望，单纯感官娱乐不等于精神快乐。”这句话一

语中的，一针见血，基本是对我们目前文艺现状一种深刻的解读和评价。精辟，深刻，准确，振奋发聩。

我以为，习总书记的话同样适用于我们少儿文学的创作和出版，其中包括国外引进的翻译作品。作为一个儿童文学作家、评论家、诗人、编辑，我感同身受。这些年，儿童文学的创作和出版进入了一个空前繁荣的局面，但是鱼龙混杂，泥沙俱下，低劣的作品充斥市场，而且还异常畅销。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怪相，一种乱相。

儿童文学的门槛低，比网络文学的零门槛高不了多少，许许多多的、没有一点文学积累和准备的新人蜂拥而至。发表作品，出版图书，成了家常便饭。我们不少作家虽然作品畅销，但很俗。正如习总书记所说：“低俗不是通俗。”我们有一些作品，恶搞老师，恶搞同学，捉弄家长，俗不可耐，但却迎合了儿童天性中的一面。一位校长忧心忡忡地对我说：“我们辛辛苦苦教书育人，这一本恶搞的书就把我们老师和教育全颠覆了，我们成了残害儿童的帮凶。”这是低俗作品所带来的恶果。“媚儿童”的倾向和前些年的“媚俗”如出一辙。这些作品都具有破坏性，而不是建设性的，不能提供正能量，相反，提供的都是负能量。打着“儿童本位”的旗号，张扬儿童天性中不健康的东西。

满足儿童的天性，满足儿童的欲望，本来是儿童文学作家创作中应当恪守的一个信条，但是我们的一些作品却并不加节制地表现儿童天性和欲望中“恶”的东西，如破坏欲、毁灭欲、暴力、恶搞、随心所欲、不尊重师长和家长等。这样的作品应当是阴暗的，黑暗的，让我们看不到希望和理想。这样的书越畅销，危害就越大。我们文艺工作者的使命和责任就是自觉抵制创作中格调低下的倾向，给孩子们送去弘扬真善美的文艺作品。

追求优秀 输送正能量

习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谈到：“优秀的文艺作品，最好是既能在思想上、艺术上取得成功，又能在市场上受到欢迎。”这是对我们文艺工作者在创作和出版上提出的新要求，也是对优秀文学作品和优秀的文学出版物提出的衡量标准，它应当成为我们的创作追

求和创作理想。

我当然知道，既有社会效益又有经济效益的儿童文学作品，是最理想的。既体现作家的责任感，使命感和担当的精神，又具有很高的文学品质，但这样的作品毕竟是少数，我相信，它并不妨碍我们将其作为我们的文学理想和文学追求。对一个作家而言，他能不能走得远，就要看他的文学理想大不大，文学追求高不高。这对每个作家都是适用的。

尽管现在是市场经济，但我们的追求不能片面地建立在经济利益至上的原则。对儿童文学来说，更是如此。因为我们肩负着向儿童传达人生经验、审美经验、伦理道德的使命，用我们的作品向孩子们输送正能量，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传达这个世界的真实美。所以说，我们应当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努力创作出思想性、艺术性都很高的文学作品。

古罗马的教育家昆体良说：“一个雄辩家既要擅长雄辩，通晓各种有价值的知识，具有较高的才能，同时也应具有崇高的思想、高尚的情操，成为一个善良的人。对于雄辩家来说，才能与德行是相互联系，缺一不可。在一定意义上，德行比才能更为重要。”这话用在我们的作家处理好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辩证关系上，同样适用。也就是说，在一定意义上，社会效益比经济效益更为重要。

其实，优秀的作品，都是作家长期以来才华和灵感高度集中的喷发。无论是曹文轩的《草房子》《青铜葵花》，沈石溪的动物小说，张之路的小说，秦文君的小说，还是金波的儿童诗，圣野的儿童诗，他们都是经过长年累月的积累才达到如此的境界和品格的。作家要能够耐得住寂寞，曹文轩多年坚持自己的风格，沈石溪多年坚持写动物小说，才能写出既具有社会效益又有经济效益、既有思想性又有艺术性的儿童文学作品。这些成功的经验，充分地证明习总书记对文艺作品标准判断的正确性。

与成年文学相比，儿童文学更需要作家具有高度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对很多儿童来说，他们只知道自己喜欢什么，而不懂什么是好的。他们还没有积累足够的文学鉴赏和识别经验。所以，一些格调低下的、低俗的、媚儿童的、娱乐性的儿童文学书才会广为流传。但我们也不能不承认，像诗歌和散文这样的作品，很难达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并举的地步，所以，让这类文本的优秀作品广为传播，我们的教育部门、推广人、评奖等都应为其保驾护航。

学习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讲话 ◆大家谈◆

风格即为道德性

□钟旅安

丁玲的友谊，那“画”中的友情真挚，都已成为艺苑坛的奇葩，着实破了“文人相轻”的陋习，创造了友谊的佳话。

本书第二部分报道了阿尔巴尼亚的浓厚文学气氛，譬如《社里的红花》和《英雄的人民》，都能看出恩波早期的文学追求；第四部分“响彻寰宇的中华之声”，是他近年所写反映中国援助阿国建设的作品。诸如《可敬可爱的“泥腿子们”》和《金光闪闪满天星》等精美华章，报道了中国技术人员援外的时代题材，彰显了这个群体淳朴又崇高的精神人格。这些普通的劳动者，为异国的幸福而不惜牺牲自己的家庭快乐，他们以博大的胸襟包容着一切，着实让人敬佩！

一些流布甚广的阿尔巴尼亚老电影《海岸风雷》《广阔的地平线》《第八个是铜像》，让郑恩波译介得风生水起，撩拨万千老影迷的甜美回忆。要做阿尔巴尼亚文化通，就该先做通识方家。这就得求真，就该解决棘

手的难题。这一点恩波解决的富有智慧与科学头脑。例如《我们如何评价卡达莱这个作家》，就为这方面的典范。这是一篇难得逼真的作家肖像。它开阔了我们的文学视野，又对异国作家多样的文化心理给予细致客观地描述。准确评价了卡达莱的道德观念，该肯定则绝不含糊，当针砭亦不留情面。对卡达莱的文学贡献评论得分十分有分寸。

作者在该书自序中道白：“我的心灵，我的志愿，我的思维，我前行的方向盘，我的喜怒哀乐，我对朋友的忠诚与眷恋，却一直是围着阿尔巴尼亚转动，一刻都没有改变。我觉得，阿尔巴尼亚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像我故乡的大海、山林、苹果园一样可爱，一样叫我魂绕梦牵。”至此，我们该会明白这“情缘”厚重的文化分量了。儒家有“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襟怀，郑恩波做到了。

(上接第1版) 黄海贝：中国的品格蕴含在中国传统文化之中，而中国传统主要是由儒、释、道三教组成的。请您谈谈它们三者的主要精神。

楼宇烈：儒、释、道三教都是提倡人要反省自求、提升自我。

儒家思想，或者叫儒家文化，在整个中国传统之中，可以说是处于主体的地位。儒家讲求天时地利人和，提倡自己创造，而不是坐等。儒家最核心的一个理念就是：只有自己做好了，所有的外力才会辅导你，即所谓的“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强调自己品德的提升才是根本。儒家认为“尽己之心”就能“尽物之心”，然后“参天地之化育”，主张“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使人自身和各种关系得以和谐发展。儒家还秉承“守常明变”的思想，即认识到事物都有它的原则或者根本的规律，但是应该在特殊的情况下灵活地处理这种规律。在儒家那儿，就被称之为“经”和“权”的关系，“经”的意思就是原则、规律，“权”就是权变、灵活。

佛家讲人的一切烦恼、痛苦都是人身造成的。从根本上讲，佛教是用来治心的，除去贪、嗔、痴之心，佛教把它叫做三毒（一切的苦都来源于这三种心）。还自我以本来的面貌，尊重人的心性。佛教之所以能在中国生根，很好地融入中国的本土文化，就是因为它提倡内省，反求诸己。强调佛就在你心中，即心是佛。要明心见性，见性成佛，而不是去向外求。成佛不能靠别人，别人只能帮助你，但不能替代你。你得靠自力，也就是靠自己的智慧和努力，来使自己得到解脱。这点与儒家，和中国文化的内向精神正好契合。

道家认为，要遵循天地万物的自然本性，不能以个人的意愿去随意改造，强调自然无为。不单是对自然，对他人也应尊重，使其按本性去发展。只有按本性发展，才能达到最充分、最完美的状态。道教也强调反省自己，不干涉他物，因势利导。道家是遁世的，很多学道之人有躲避现实的行为。如果我们正确领会了自然无为的思想，对调整社会关系和个人身心都有非常积极的意义。特别是道家旷达的精神，很多事情看得开，放得下，中国人都是非常旷达的。

儒、释、道确实是中国文化里鼎足而立的三个支柱，一个鼎至少有三只脚才能站得住，缺一只脚都不行。所谓“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明白地道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结构特征。三者既有不同的一面，又有相互贯通、相互影响的一面。这三种思想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同来支撑中国的传统文化。

我们在传承中国传统文化时，同时应该清醒地看到，存在于传统文化中，特别是儒家伦理中一些封建糟粕。作为一种几千年存在过的、而且

有着广泛深刻影响的历史文化，只要有合适的环境，它就有可能死而不僵、沉渣泛起。

黄海贝：礼教是伦理教育，乐教是艺术教育，您特别看重礼乐教化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为什么？

楼宇烈：中国文化最根本的特征是以人为本，以人为中心。它是人文的文化，体现出一种人文的精神。那么，这种人文精神是怎样养成的呢？主要是通过传统的礼乐教育。

中国文化的精神性有两个方面，一个是伦理的精神，一个是艺术的精神。二者相互配合，不可分割。礼是用来规范人的社会身份和社会地位的，即“别异，明分”，确定每个人在社会上的责任、权利和义务，就是建立社会秩序。而乐，按照传统的说法是用来“统同、合群”的。通过乐教使不同等级的社会达到和谐一体。人们通过乐来表达自己的志向、情感，通过乐来交流，从而构建起和谐的人际关系。

过去常常讲，中国历史上的文化是一种伦理的文化。这种看法有其片面性，只看到礼教而忽略了乐教，其实在中国历史上是非常重视乐教的。中国的文化是艺术的文化。中国有许多的艺术形式，单从文学上讲就有汉赋、唐诗、宋词、元曲和明清小说。从音乐上讲，一直延续下来的就有琴、棋、书、画，如果继续上溯，还有六艺（礼、乐、射、御、书、数），这些都是我们艺术宝库中的精髓。

比如古琴和昆曲。中国的古琴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弹拨乐器中最古老的一种乐器，至少有3000多年的历史；而昆曲可以跟印度的梵剧、希腊的悲剧、日本的古典戏剧“能”相提并论，并较它们更胜一筹。对于乐教，孔子曾经讲过这样一句话：“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即通过乐来完成对一个人的培养，把乐看成是人格的最高境界。

在中国，道德教育和艺术教育的紧密结合，使得道德所追求的最高境界，常常也是艺术所追求的最高境界。我们讲“真善美”，“真”是对知识、真理的追求，“善”是对伦理、道德的追求，“美”就是对艺术境界的追求。中国人不仅讲“天人合一”，也强调“真善美”的统一。道德的追求和艺术的追求在极值点上是完全融通、合二为一的。有人说，中国人的生活是艺术的生活。总之，中国文化渗透了一种追求艺术境界的艺术精神，礼乐教化就是其中最重要的部分。

不过要懂得中国文化的精神，直接由“道”入手是比较困难的，因为“道”都是一些比较抽象的道理，很难理解，而由“艺”入手就比较容易。很多人都喜欢欣赏中国的古典诗词，我们读诗的时候，不仅要停留在诗的本身，还要看一些诗论、诗词，这对于我们了解中国文化的艺术精神是十分有帮助的。

黄海贝：我是个古琴爱好者，您将古琴看作是礼乐教化中有标志性代表性的一种乐器，为什么？

楼宇烈：《礼记·曲礼》里面讲到《士无故不撤琴瑟》，士人不能随便便地撤掉琴瑟或者瑟，因为琴和瑟不仅仅是外在的表象。陶渊明在墙上挂上了一张无弦琴，他有这样一种观念：“但识琴中趣，何劳弦上声”。只要能够领会、享受意趣，又何必弹出声音来呢？

琴棋书画四者中，为什么琴排在第一位呢？东汉有一部文献叫做《白虎通义》，是汉章帝召集的一次会议的记录，是把儒家的一些治国和人生修养的理念规范化、制度化的一部文献。它讲到琴的时候说：“琴者，禁也，禁人邪恶，归于正道，故谓之琴。”琴就是禁、禁止，它能禁止人的邪念，使其归于正道。这应该是中国古代对于琴的作用的一个基本认识，也是一个共同的认识。汉代文学家蔡邕在《琴操》里讲：“昔伏羲氏作琴，所以御邪僻，防心淫，以修身理性，反其天真也。”“反其天真”，用佛教的话来说，就是回到它本来的面貌，也就是说琴是用来恢复人的自然本性、防止其流于邪淫的，是用来修身养性的。同样，其他艺术形式也都起这样的作用。

黄海贝：您一直提醒我们要有一种文化的忧患意识。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文化也在向全球化发展。当今世界上一些强盛的强势文化正在深刻地影响着其他国家的文化，我们怎样在与强势文化的交流中，保持一种清醒的文化主体意识，既汲取对方的营养，又不丧失我们自己的民族文化，维持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独立性？

楼宇烈：我一直主张要对文化发展进行认真的研究。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对文化发展进行总体的战略性的思考，那么这个国家的文化发展肯定是有序的、混乱的。现在很多国家都非常重视文化发展的战略问题，美国有制定文化发展战略的专门机构，欧洲许多国家也有，亚洲像日本、韩国也都非常重视这个问题。

从古至今，不同类型的文化之间的交流在不断地进行着，互相融通是一种交流，互相冲突其实也是一种交流。交流是一种文化作为主体去吸取另一种文化中对自己有益的营养成分来丰富和发展自己。正因为如此，我认为不同文化进行交流时，是不能没有主体意识的，否则就会出现主而入，就会沦为其他文化的附庸。

我们现在虽然高喊要保护、传承、发扬我们的传统文化，但如果我们将树立起一种文化的主体意识，那么，我们这样去保护它，反而会使它丧失本来的民族特性。尽管表面上做得轰轰烈烈，结果——用一句现在时髦的话来讲——反而是解构了我们的传统。树立这种主体意识，就是要强调以我为主，而不是去迎合时代，迎合现代

文学批评是文学众多体裁的一种，那么文学批评的文本可读性，无疑与任何文学体裁的文本可读性一样，有着深刻而非凡的意义。

文本可读性并无概念上的定论，但并不影响我们的理解，拓展开来也许会有多个层面的指向，但究其核心，大约是指文本所具有的吸引读者的程度，以及对读者灵魂的震撼程度而言，关于温暖、感动与疼痛等如斯，这些与人类心灵息息相关的精神力量。似乎可以说，任何对读者缺失吸引力的作品，已经从其根本与源头上失去了存续的一半可能，当然若仅仅停留在单纯的吸引，其文章所产生的审美力量是远远不够的，或者说极易消散的，但至少可以确定的是，文本可读性本身，是一切文字作品内在意义的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甚至是较为重要的那一部分。

若一部作品是作者借由文章所建构的精神秘境，那么文本的可读性应该是吸引读者走入、直至走完这处秘境的唯一可能。永远没有任何真正的读者，会对或枯索、或乏味、或浅薄或晦涩，或莫名其妙的作品，愿倾注自己认真的心灵与弥足的时间。如果说文本的意义是作品的内涵所在，那么是否可以说，文本的可读性，便是对一部作品的“意思”的呼求与考量。此间的“意思”，该是作者借由表达上的深度意趣，而完成的对文本意趣的赋予。但绝不仅仅是停留于读者意趣意义上的趣味，一部作品真正的意趣，必定是那种趣味之后于读者心神魂魄的深度荡涤。

文本的可读性，必不会是晦涩的武林秘笈，更非刻意地幽而深之，相反，于一部作品的诸多意义而言，可读性是先声夺人的气象万千，亦是作者诗思意想的最为智慧之表达，是对作品意义的另一种形式的阐释。作者所要表现的内容是作品的意义所在，而完成这种意义表达的方式方法甚至技巧，以及其创造吸引读者的强烈程度，是抵达其意义的必经之路。吸引了读者，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大约已经成功了一部分，若期待实现其全部的艺术审美，当然还包括其深刻的精神指向。而在文本可读性的内在意义中，事实上无论你的文本之内蕴涵着怎样的深邃与高妙，若不能强烈地引人读下去，读完，那么一切无疑都将覆灭其间，或沦为寂寞的废话，永远沉积于时间深处，或消失于沉默的空间之内，黯然灰飞烟灭。

表现于另一种与文字相类似的语言表达上，就如同说一个讲述事件的人，事件内容本身，无疑是讲述的要点所在，而如何准确、精彩并意趣横生地将事件讲述出来，并足够吸引听者，并令听者最大限度地领会讲述的事件，几乎决定着“讲述”这个行为的大部分意义。惟有如此，才令久于长久萦怀回味，引发想象，启迪心智，洞晓美德与卑劣，阐发人性的明与暗，揭示信念与理想，如此种种，方才完成了意义的全部。因此事实上，文本可读性本身，是文本意义的另一种形式的存在，也就是说，既是抵达意义的毕竟之路，更是作品意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内涵的补充与外延。

于文本自身的意义指向而言，作品的文本可读性，若细细探究，也许还有着其隐秘的繁复深远的潜在内涵。不难感知，有时候，它竟不可思议地影响着作品的基础，甚至是整篇作品运行的节奏，这种发现是迷人的，因为这一切远不止吸引那么一种对读者的吸引，也不为对读者审美的启蒙，不止是善良和力量，几乎就是一种悲情。

语言、表达方式、谋篇布局、诗性的彰显与隐匿、情绪的旋律、情感的节奏等等，这些无疑都是决定文本可读性的关键与必须，对作者自身更有着强烈可读性的表达要求，这就要求作者本身拥有一个更神秘的、有着强烈可读性的、辽阔而深沉的灵魂。由此甚至可以大胆地说，一部缺失文本可读性的作品，其所谓的思想意义几乎就是可疑的，就如同一个表现得枯燥无趣之人，其内在的精神质地，我们可想而知，事实上也必定好不到哪儿去。简而言之，一个高级而有趣的人，其一切必定是由内而外的和谐统一，这是一种精神结构的伦理，更是文学作品健康呈现的规律，甚至是作品生存的艺术秩序。

其实无论任何文本，包括文学批评文本，它的可读性同样具有这样神秘的力量，打开作品的刹那，它的可读性便有如巨人安泰脚下的大地，只要读者轻轻触碰，便刹那被给予了阅读所带来的无穷神秘力量，并一路将作者引向作品意义的最深处，那些人类精神赖以活命的审美彼岸。

要学习天地的品德。《老子》曰“生而不有长而不宰”，包容一切而不是想着去主宰一切。

和谐，要清除贪念。人与生存环境的不和谐，社会的不和谐，家庭的不和谐，身心的不和谐，归根结底是由于贪念。净化心灵，清除贪念。人心常清净，万物自和谐，人我自和谐，家庭自和谐，身心自和谐。道教从老子到庄子都强调知足，自足其性。

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理念，万物由和谐而生。自然界通过自身不断的调整使不和谐达到和谐。社会发展过程中永远都会出现不和谐不平衡，而人的努力就是让它回归到和谐，使社会能发展行进。

黄海贝：如果就个人来说，我们如何从优秀传统文化中去汲取精华，修身养性，做一个合格的公民？

楼宇烈：人应该追求什么？什么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发展？人要获得真正的自由就要既不受物的约束，也不受神的约束，还自我以本来面目。人需要一定的物质基础，在有了一定物质保障的前提下，还要提升自己的精神追求。现代发展理念往往是最足的额外的物质追求，从文明的角度讲反而是一种倒退。物质发展了，精神也要发展，在发展精神文明的时候，传统文化可以给我们提供丰富的资源。

现代社会最缺乏的就是人文精神，最大的精神痛苦是做不到了自己的主人。在自我无法解决的时候，又求之于神。但人的问题还是要人自己去解决，发挥自己的能动性。

儒家很重视个人的身心修养，修养就是一个人整体素质的养成问题，它要通过教育来实现，同时，儒家也看重个人内心的自觉性，认为修养是一个自觉、自律的过程，也就是“克己复礼”的过程。“克己”，实际上是指人们道德的自觉性